

校长面对面

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

“双一流”建设应发挥地方高校优势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2015年10月是一个需要记住的月份。因为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从此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

或许是一种巧合,几乎就在“双一流”战略出台的同时,在宁波大学所在的宁波市,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打响了起跑的发令枪。

如果将“双一流”战略也比喻为一场将持续很久的马拉松的话,以宁波大学为代表的地方高校应该在这场长跑比赛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又该以怎样的状态达到最后的终点呢?从两年前那声来自北京的“发令枪”声响起后,这些问题就时常出现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的脑海中。

众所周知,在“双一流”战略实施之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也有一些其他重要工程,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然而,“双一流”战略却与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宁波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双一流”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沈满洪表示,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地方高校在这场高等教育的“马拉松”中,有了参与的契机和盼头。“双一流”至少给了地方高校一个机会。

然而,能够参与是一回事,如何参与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前,提及“双一流”战略时,大部分人还是将目光对准综合性大学和原“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那么,在“双一流”的布局中,地方高校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地方高校首先还是要追求一流学科,谁首先能够在某一点上突破,谁就有希望进入一流的行列。”沈满洪说,总体而言,地方高校在整体实力上与两大工程高校还有一定差距,但这并不妨碍地方高校在某一点上突出自身实力和特色。不过,这就需要与学校本身的区域定位紧密相生了。

以宁波大学为例,作为一所沿海地区的高校,海洋学科一直是其着力发展的重点学科之一。“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我们非常强调‘海洋化’这个特色。事实也证明,其他学科对接海洋学科的尝试也都是成功的。”沈满洪说,同时,在这样的学科对接和学科交叉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增长点。

据悉,宁波大学近期也将出台专门针对学科交叉的相关文件,内容包括学科交叉平台建设、学科交叉团队建设等。下一步,该校还将出台学科特区政策。“我们试图用学科、人文素质教育的政策,学科交叉的思路来建设学科。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在个别学科上取得一系列突破。”沈满洪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高校一直都承担着服务地方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双一流”战略也强调对国民经济的支撑、推动作用,但更多的是瞄准国

业好找工作,就去培养哪个专业的人才,而是要考虑大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沈满洪说,高校要认识到,有些学科专业是具有市场竞争性的,比如计算机、工商管理,有些专业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如文史哲、数理化的基础学科。这些学科不可能依靠社会竞争获取资源,但没有基础性学科的支撑,其他学科很难有好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人才培养和学科设置要满足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

自主权含金量不亚于资金投入

自“双一流”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在大力推动相关建设,很多地方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然而在沈满洪看来,除了资金支持外,地方高校发展“双一流”,还需要得到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其他的一些帮助与扶持。

“毋庸讳言,对于高校发展而言,增加投入一定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给予高校进行改革的自主空间。”沈满洪强调,对于高校的发展而言,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实际含金量并不亚于资金投入。

他表示,高校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激发,是需要体制、机制激励的。“为什么国际上一些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事实上,就在“双一流”战略出台后不久,有关部门曾向公众表示,在“双一流”建设中,政府将逐步落实高校自主权。不过,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涉及不同方面。如今,高校最需要落实的自主权又该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学科专业设置的自主权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沈满洪说,高校为什么会呈现工厂化生产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学科转专业设置灵活性不足。上世纪90年代,国内某高校曾设立过房地产专业,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撤销。但事实上,该专业在四年的兴办过程中,培养的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进入了房地产领域,甚至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

“越是这样的专业,其专业性越强。”沈满洪坦言,反观当前,很多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过于死板,导致千校一面。所以,怎样才能将学科专业的设置权下放给学校,需要有关部门思考。

当然,在有关部门下放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如何才能行使好自主权也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内部体制机制的构建就显得很关键了。”沈满洪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外部问题。同样规模、同样投入的学校,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差,这就是学校内部体制机制构建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理清高校的内部体制机制,对行政权力的约束非常重要。

“高校内部主要是行政权、学术权和以教代会为代表的民主权相互制衡的结构。这中间,校长常常有绝对的行政权,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由校长来配置。”沈满洪说,毕竟一个人和一个班子的视野是有限的,高校的发展要借鉴学术委员会和教师们的意见。“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相互制衡的框架,但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本报实习生阎风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海峰随笔

谈谈「教育学家」

刘海峰

在当代中国,教育家多,教育学家少。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只要做到相当出名的时候,往往就被称为“教育家”。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多校长以及各学科的著名教授都成为了教育家。另一方面,全国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很多,教育学界做出成就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却很少有人成为“教育学家”。

与法学界经常称某位学者为“法学家”或其他学科多称某某“学家”不同,中国教育界很少称中青年学者为“教育学家”,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学专家,也较少被称为教育学家。我觉得教育学界这个传统还是好的,即比较严格。

2009年9月,笔者被特邀到北京出席“高校招生考试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18日晚,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张千帆教授请笔者参加一个“招生考试与宪法平等——教育学家与法学家的对话”。法学界因为每两年会评出“十大青年法学家”,自2005年以来还每年举办一届近300人参加的“中国法学家论坛”,大家对“法学家”之称已经习以为常,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三四十岁的法学教授或副教授被称为法学家也常见。而当时笔者已经50岁,当了17年的教授,出版了近20本著作,获得过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6次,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这是笔者平生第一次被称为“教育学家”,感到不习惯,也不大自在,因为在教育界,一般都只称“教育学者”,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用“教育学家”的头衔是很慎重的。中国法学大概是最常称“学家的”学科,而教育学大概是最少称“学家的”学科之一。

成名不易,成家更难。从高标准来说,成为某某“学家”应该能够“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开宗立派,或者其学术要有独门的贡献,自成体系。做学问贵在自成体系,因为注重体系,有宏大构思,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就像由众多石块垒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样。而没有总体规划所进行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如一堆乱石,或者只建成许多平仄的建筑,形不成巍峨的大厦。

自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以来,笔者在教育学界已经行走走了33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科举、高考与高等教育三个领域,特别是提出并推动形成了科举学这一专学,并为理性认识高考制度、稳步推进高考改革出谋划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从一个“善鼓瑟而立于学门者”,到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重要同行所认可和接纳,令人欣慰。只是笔者有自知之明,自己离真正成为“教育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的人都会感觉到,和其他人文社科相比,教育学确实地位还不够高,或者成熟度还不够,毕竟诞生时间比较年轻,不像有些老学科和传统学科。教育学科经常被一些传统学科(比如文史哲或者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因此不太被看重。

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科是“帝国学科”,从业人员最多,也最成熟,所以才会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情况。社会学和法学也很庞大,而且国际上也高度重视。在国外,有些人认为教育学是二等学科,有的人甚至称之为次等学科。在我国上世纪30年代,也出现过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把教育学科说得没有什么必要,影响到有些大学对教育学科要么撤销、要么缩小,许多大学刚成立不久的教育学院又改回教育学系。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就没有教育研究所,建国后的中国科学院和后来的社科院也没有教育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是隶属于教育部之下设置的,其他如财政部下面还有财经研究所,但社科院里面仍然有经济所,就是没有教育学所。台湾现在的“中央研究院”延续民国时期的体制,也是没有教育研究所。从民国时期到台湾延续下来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学的“中研院”院士。台湾地区不像我们大陆有中断和动乱这种不断的影响,他们一直延续下来,而且也是受到欧美的影响,按理说学术传承很清晰,而且积累很丰厚,可是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相比就是比不上,可能人们认为教育学科做出来的成果和其他学科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当然,我们身在教育界的人都知道教育学科非常重要,毕竟教育学是关于培养人的活动的学科,中国的教育问题十分重大而复杂,教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教育学科会有很光明的未来。教育界的学者或者“学家”们,只要励精图治,共同奋斗,做出成就,就能逐渐提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就笔者自己而言,也将持之以恒,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让成果说话,用事实说话,争取做一个让他强势学科的大牌教授不敢小看教育学科的学者。

现场

让优秀传统文化沁润学生心田

——北京科技大学启动首届传统文化节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因为“觉得汉服很好看,很吸引人”,所以大一就加入了尺素汉服社。

说起汉服,李邓宇便开始滔滔不绝。“现在的正式场合,大家通常会穿西服、小礼服等服饰”,她却觉得,传统的汉服也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她也是这么做的。平时,她会穿着汉服走在校园里,或是去上课。

“起初,还有人问我这是和服还是汉服。”李邓宇说,现在大家不会有疑问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是汉服,同时这在无形之中对汉服文化进行了宣传,对此她感到十分自豪。

传统文化教育不应只是两个月

古语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于是,“礼仪之邦”“衣冠上国”便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它们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也流传千年,体现在诸多领域,比如武术、汉服等。

秉持着对武术的热爱,孟飞一时就加入了太祖拳协会,在前辈和外聘教练的指导下,习武两年的他不仅加深了对武术的认识,也逐渐感受到了武术所带来的好处。

“通过练习武术,我感觉自己从内到外都得到了提升。”孟飞说,内就是精神状态,现在比习武之前更好了;外就是身体的耐力、柔韧性、协调性,都有了质的飞跃。

对此,太祖拳协会负责人、研一学生陈尚感受更多的还是武德。

“习武先讲德,这是教练在教我们练武前就多次强调的。”陈尚说,没有武德,就不可能在武术上有大的建树,更有可能走入歧途。

加入尺素汉服社一年多来,李邓宇通过前辈的讲解和自己的学习,对汉服的认知更深了,除了可以展现服饰之美,还可以展示所承载的文化”。

肖宇说,其实以前是一个比较邋遢的人,但自从接触了汉服,整个人像是变了个样子,感觉现在的自己非常有气质。

巧合的是,李邓宇也用了“气质”这个词来形容传统文化或者说汉服对自己的影响,“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提升,从内到外的温文尔雅和气质”。

李邓宇和肖宇觉得,传统文化节可以让同学们更加系统地认识传统文化,但同时也有一个担忧,那就是两个月结束后,传统文化教育是不是也会停止呢?

“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肖宇希望,传统文化节可以融入学校的日常教学与工作中,让每位同学都喜欢去学习,有机会去接触。

营造传统文化氛围实行三步走

对于李邓宇和肖宇所担心的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于成文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传统文化节将成为学校每年文化建设的一项盛事,融入日常工作,希望学生们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据于成文介绍,对于首届传统文化节,学校将充分整合已有资源和不同部门,并做到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校园历史、结合学科特色的“三结



北京科技大学与会领导为首届传统文化节揭幕。王之康摄

合”,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以营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郁氛围、厚植人文沃土、践行民族精神“三步走”为方针,开展包括主题宣传、主题文化、主题实践三个系列的十项具体活动。

“主题宣传活动以‘颂满井之韵·举中华之光’传统文化主题外展为平台,通过现场展示与互动体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扬,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校园文化氛围。”于成文说,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包括举办系列讲座、人文知识竞赛、主题团日、戏剧节、诗词大会等活动,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地气”,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入眼入脑入心;主题实践活动包括“寻根——传统文化中国行”社会实践活动与“逐梦——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者”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广大师生身体力行地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与引领者。

“高等教育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权良柱强调,青年学生必须保留中华民族的底色,在学习传统文化过程中,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培养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提升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